

· 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 ·

## 中国服务业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吗？

江 静

(南京大学 经济学院, 南京 210093)

**摘 要:** 虽然当前中国已步入服务经济时代,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起主导性作用, 但中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一定差距。基于 2002-2012 年投入产出表的核算结果显示, 中国服务部门的服务投入率从 2002 年的 44.33% 上升到 2012 年的 55.25%, 服务业所需中间投入大多来自服务业本身, 即服务业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基于全国 30 个省市 2000-2014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 服务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 当前人均服务业产值提高 1 个百分点, 会带来 1 年后服务业人均产值提高 0.39 个百分点, 2 年后服务业人均产值提高 0.32 个百分点。分地区和分行业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结论, 且发现东部地区的服务业独立发展路径依赖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 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独立发展路径依赖更为明显。中国各级政府在制定服务业发展政策时, 不能仅仅提出提高服务业占 GDP 比重的目标, 而应该更好地认识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 引导服务业自我发展。

**关键词:** 服务业; 独立发展; 路径依赖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6ZDA015); 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15ZD0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15JJD790016); 南京大学区域经济转型与管理变革协同创新中心重大课题“加快服务经济发展的制度和环境研究”

### 一、引 言

阿尔文·托夫勒(2006)指出“几千年人类经济发展的总历史将表现为三个阶段: 产品经济时代、服务经济时代和体验经济时代。”当前全球已经逐渐步入服务经济时代,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起主导性作用。2014 年全球服务业产值占 GDP 比重高达 68.47%, 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 经济服务化趋势更为明显, 2014 年美国服务业占 GDP 比重为 77.98%, 日本也高达 71.97%。从增长速度看, 近年来发达国家服务业增长率在大多数年份都高于工业的增长速度。

当前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 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 包括去产能、降成本等, 表面上集中在制造领域, 但其核心还在于服务业的投入。大量研究表明, 服务业的知识和技术密集型特征可以有效提升制造业的技术水平, 降低制造业的制造成本和交易成本, 进而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刘志彪, 2006; 江静等, 2007)。当前中国供给侧改革中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各类要素集中投入于一般性制造业, 而事实上需求主要集中在服务行业。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 “开展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行动”, 把“服务业比重进一步上升”作为“十三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这是经济进入新常态后, 中国加快走向服务业大国、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内在

要求和重要举措,这也是中国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抓手。

近年来,中国现代服务业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增长。作为“十五”时期的开端年,2001年中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41.3%,比同期全球服务业占比(67.85%)低26.55个百分点,中国出现了“逆服务化”发展趋势。此后,中央颁布多项文件和措施促进服务业发展,服务业占比逐年提高,2012年首次超过第二产业占比,2015年服务业占GDP比重为50.5%,比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约高10个百分点,服务业成为中国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然而国际比较发现,服务业占GDP比重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依然有一定的差距。这意味着虽然政府出台各种政策,如通过放松服务业管制、税收优惠等政策来鼓励服务业发展,或通过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来完成产业升级、提升制造业竞争力并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但这些政策并没有起到预期效果。因此,我们在对政策有效性进行反思的同时,也需要寻求深层次原因。

江小涓、李辉(2004)的研究表明,中国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服务业比重在低水平上保持稳定发展的现象与我国经济增长模式、经济体制、认识和政策以及统计口径等多方面的原因有关;裴长洪和夏杰长(2005)认为开放不足是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的重要因素之一;汪德华、白重恩和张再金(2007)支持了上述结论,他们的研究表明,服务业的发展受政府规模、以法治水平来衡量的维护契约执行制度质量的显著影响,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规模较小、司法体系能够较好地发挥第三方执行的功能、创造出更好的契约执行环境,则服务业所占GDP的比重会相对较高。江静、刘志彪(2009)指出,中国服务业发展并不是遵循西方发达国家产业自行演化的路径,也不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同步发展,中国经济的“逆服务化”趋势与经济转型时期在经济中居主导地位的政府行为密切相关,基于政府职能缺失而引发的公共性服务发展滞后,并在此基础上导致消费性服务和生产性服务需求不足而发展滞后。

本文认为,服务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忽视服务业发展自身规律而盲目出台各种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效果。本文接下来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现有的相关研究及评述;第三部分是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描述性统计及假说的提出;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第五部分是稳健性检验;第六部分是简短的结论。

## 二、现有的相关研究

长期以来,对于产业关联的研究重点关注的是制造业和服务业之间的关系。Grubel & Walker(1989)的研究表明,服务业能把这些日益专业化的知识资本、人力资本和技术资本导入商品生产过程,从而在增强现代生产过程迂回性的同时使资本进一步深化,不仅提高了服务业投入在制造业效率中的贡献,也提升了生产过程中其他生产要素的生产率。服务业的发展,无论是作为制造业内部的某个部门,还是独立的企业,在深化劳动分工、降低制造业成本提高劳动生产率等方面,都发挥着关键作用(Hansen,1990)。另一方面,制造业的发展也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市场支持。Bhagwati(1984)发现,生产过程在国内和国际间都在不断地分化,因此原来在制造业内部的服务业现在正逐渐分离出来,从而导致服务业比重不断增加;更重要的原因是制造业的结构转型,使得生产过程中对中间性服务性投入的需求也越来越多。此后更多的研究(Francois,1990; Rowthorn & Ramaswamy,1999)也支持了他们的结论,认为制造业作为服务业发展的中间需求对服务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江静(2010)则分析了中国的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关系,认为服务业作为高级要素投入促进了制造业发展,而以代工生产和加工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制造业并没有形成服务业发展的市场支持,这意味着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阻隔了服务业和制造业

之间的产业关联。

Park(1994)的研究开始关注服务业本身。他的研究表明,服务业发展具有“自增强”效应。他利用东南亚9个国家1975年和1985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了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依赖关系。他认为,不仅制造业对服务投入有较大的需求,服务业自身各行业也对服务投入特别是流通、通讯、生产性服务(金融、咨询、软件、商业服务等)有较大的需求,甚至高于对制造业的投入需求,这在日本、新加坡等国家尤为明显。Greenhalgh & Gregory(2001)也指出,在知识密集型经济或者新服务经济的时代,服务部门在产出增长和就业机会创造方面已经成为一个关键的部门,并且开始依靠自身的力量在服务部门内部取得了长足的发展。Pilat & Wölfl(2005)的研究结果表明,相对于制造业,服务业更独立于其他非制造业部门,生产性服务所必要的大多数中间投入直接来自于服务部门自身。程大中(2008)对中国和13个OECD经济体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部门结构及其影响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中国服务业受其他部门需求的拉动作用不大,并且其生产性服务投入率较高,更多地依赖自身的投入,但其研究重点在于生产性服务业与第一、二产业的产业互动及国际比较,未能明确提出与阐述中国服务业的自我促进效应。

曾世宏(2013)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服务业结构变迁的“自增强”假说。他认为,工业化的中后期,制造业或者农业的发展主要依赖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且服务业内部的生产性服务业、消费性服务与公共性服务业也主要依赖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即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整个经济体各行业的重要中间投入时,服务业发展就产生了一种“自我强化”机制,表明服务业进入了良性循环的发展轨道,此时生产性服务业与其他各行业的前向产业关联度增加,他还从国际经验、数理模型和实证分析等多个角度对这种机制的存在和实现进行系统地分析。

本文主要利用中国历年投入产出表分析服务业发展对服务性投入的依赖程度,从而提出“服务业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的假说,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实证检验。

### 三、基于投入产出表的描述统计及假说的提出

一般来说,某个产业在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中间投入,而中间投入包括物质投入和服务投入两部分。物质投入主要是各类有形的物质中间产品,通常由制造部门提供;而服务投入则主要是无形的服务产品,通常由服务部门提供。我们用服务投入率,即服务投入占中间投入的比重来表示某产业对服务投入的依赖程度。根据分析产业的不同,服务投入率有两类:第一是制造部门的服务投入率,表示制造业对服务投入的依赖程度,从行业层面看,可以根据该指标分析制造业与服务产业的产业关联性。第二是服务部门的服务投入率,是服务业发展与服务本身投入之间的关系,比值越高,说明服务业发展受自身投入的影响越大。本文重点分析服务业发展的路径依赖问题,因此主要指标选择为服务部门的服务投入率。

本文主要利用投入产出表来分析。投入产出分析是在投入产出表的基础上研究经济系统各个部门间相互依存关系的经济数量方法,由里昂惕夫最早提出。投入产出表可以弥补常规国民经济统计资料以增加值为基础进行核算的缺陷。中国的投入产出表每5年编制一次,在逢2和7的年份,国家统计局、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联合发文,布置并组织开展全国投入产出调查,编制投入产出基本表。目前中国编制了共6张投入产出基本表,分别是1987年、1992年、1997年、2002年、2007年和2012年。由于投入产出表5年编制时间跨度较长,不利于连续分析,因此在逢0和5的年份又编制了投入产出延长表,不采取直接调查方式,而是根据最近调查年份资料进行编制。考虑到行业分类的可比性,我们重点分析的时段是2002-2012年。为保证分析

的连贯性 我们再加入 2005 年和 2010 年的投入产出延长表进行分析。

根据行业分类的粗细程度不同 投入产出表在编制中会列出各个不同的部门 如 17 部门、42 部门以及 133 部门。<sup>①</sup> 考虑研究问题的现实性 我们选择 42 部门的投入产出表。2012 年投入产出表目前公布的数据是 135 个部门 我们对此进行了行业合并 汇总成 42 个部门 这样与前几个年份相对应。具体计算服务部门的服务投入率的方法是: 第一 根据不同的行业将投入产出表中纵向投入部分的中间投入区分物质投入和服务投入两类 将服务投入部分加总; 第二 计算服务投入占中间投入的比重; 第三 根据投入产出表横向产出部分的各个服务业细分行业确定各个部门服务投入率的具体数值。

表 1 是根据 2002、2005、2007、2010、2012 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 延长表) 计算的服务部门的服务投入率。可以发现 整体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所需的中间投入中 来自其本身的服务性投入呈总体上升趋势 2002 年的服务投入率为 43.33% 2005 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下降 此后又逐年上升 到 2012 年为 55.25% 这意味着服务业发展中物质投入占比为 45.75% 服务投入的比率已经高于物质产品的投入 服务业发展已经较多地依赖其自身的服务投入。

表 1 中国服务部门的服务投入率( %)

行业	2002 年	2005 年	2007 年	2010 年	2012 年
整体服务业	43.33	38.66	43.27	44.58	55.25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40.70	39.35	34.15	36.08	48.68
邮政业	30.74	36.54	54.06	59.92	62.14
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19.44	25.91	45.41	51.67	56.69
批发和零售贸易业	41.63	49.76	71.33	74.65	83.43
住宿和餐饮业	20.96	19.31	19.29	15.20	21.52
金融保险业	56.03	71.72	79.28	82.11	83.55
房地产业	55.52	56.06	53.63	57.38	80.12
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	26.69	39.85	37.95	44.61	43.62
旅游业	69.74	-	-	-	-
研究与试验发展业	21.31	34.17	26.80	30.32	35.34
综合技术服务业	36.27	58.97	45.75	51.95	50.65
水利、环境和公共社会管理业	-	30.26	31.76	32.94	41.60
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	17.94	29.58	32.76	34.50	39.74
教育	25.06	34.58	49.19	50.42	59.77
卫生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业	13.22	17.11	16.90	12.25	19.88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30.06	43.42	41.49	37.70	49.64
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38.32	58.15	53.63	58.17	64.49

从细分行业来看 几乎所有的细分服务投入率总体都呈逐年上升趋势。具体特征如下:

第一 部分行业早年服务投入率相对较低 但提升幅度较快。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2002 年的服务投入率为 19.44% 即中间投入中有 80.56% 是物质投入 到了 2007 年该比重达到 45.41% 再过 5 年到了 2012 年则上升到 56.69% 物质投入下降为 43.31%。

第二 部分行业服务投入率一直呈现出较高的水平 且发展速度较快。如批发和零售业,

① 由于行业的不统一 有些投入产出表公布的是 40 部门或者 135 部门。

2002 年服务投入率为 41.63% 到 2012 年上升为 83.43% 即物质投入仅占 16.57%; 此外还有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 这两个行业 2012 年服务投入率也高达 83.55% 和 80.12%。

第三 部分行业服务投入超过物质投入 这也意味着其发展对服务投入的需求更大。如综合技术服务业( 2012 年服务投入率为 50.65%)、教育行业( 59.77%)、公共管理和社会组织( 64.49%)。

上述分析表明 中国服务业发展的中间投入中 服务投入比重越来越高。North( 1990) 从制度角度分析为什么所有的国家没有走相同的发展道路时指出 制度变迁存在着路径依赖现象 一国的经济发展一旦进入某路径 就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 存在着自我强化的机制。沿着既定的路径 经济和政治制度变迁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迅速优化; 也可能顺着原来的错误路径往下滑 进入锁定的状态 要想改变则非常困难 往往要借助外部因素实现扭转。根据这个界定 本文认为 服务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由于服务业发展更多依赖服务投入 服务业发展受自身发展程度的制约。在服务业发展初始条件比较好的地区 服务业可能可以获得更快速的发展; 而初始服务业发展较差的地区 可能受制于其服务中间投入不足 服务业具有内在的封闭性路径依赖 进而使服务业保持长期的低水平稳态发展趋势。

基于此 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服务业所需的投入大多是来自本身 依赖其他产业投入相对较少 服务业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

## 四、实证分析

### (一) 变量、模型与数据

本文设定如下模型来验证服务业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规律:

$$\begin{aligned} serv_{it} = & \beta_0 + \beta_1 serv_{it-1} + \beta_2 serv_{it-2} + \beta_3 pro_{it} + \beta_4 pgdp_{it} \\ & + \beta_5 gov_{it} + \beta_6 exp_{it} + \beta_7 urban_{it} + \beta_8 policy_{it} + \mu_{it} \end{aligned}$$

相关变量及说明见下页表 2。被解释变量  $serv$  是服务业发展水平 用国民经济统计中第三产业来代替服务业 不包括农林牧渔服务业( 第一产业) 和建筑业( 第二产业)。<sup>①</sup> 我们用地区人均服务业产值来代表服务业发展水平。<sup>②</sup>

模型中引入了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滞后变量 分别滞后 1 期和滞后 2 期 以此考察服务业发展的独立性 即服务业发展的历史水平是否影响当前服务业发展。这是模型的主要解释变量。

我们还选择了如下控制变量。考虑到服务业发展的中间投入分为制造业和服务业两部分 因此在控制变量中加入了制造业投入指标 近似用工业劳动生产率  $pro$  来衡量 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工业增加值除以从业人员年平均数来表示; 经济发展水平  $pgdp$  用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表示; 政府规模  $gov$  用地区财政支出与 GDP 的比值来表示; 开放程度  $exp$  用地区出口总值与 GDP 的比值表示; 地区城市化水平  $urban$  用地区非农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表示; 政策变量  $policy$  主要反映政府政策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中国正处于转型时期 政府对经济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因此其在服务业方面的政策变动也会对服务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在 2000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政府首次提出要改造提高传统服务业以及发展新兴服务业; 2001 年 12 月中国加入

① 根据 WTO 的分类标准 农林牧渔服务业和建筑业也属于服务业。

② 这里的服务业总共包括批发和零售业、交通运输仓储及邮政业、住宿和餐饮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房地产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社会管理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教育、卫生和社会工作、文化体育和娱乐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共 13 个行业。

WTO 服务业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点领域,包括电信和金融保险等领域的对外开放力度都在不断扩大,这对中国服务业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考虑到国内促进服务业各项具体政策出台的滞后性以及各个服务领域开放时间表和开放程度的不一致性,我们将 2003 年作为分界线来衡量政策影响。 $\beta_0$  为常数项, $\mu_{it}$  为随机扰动项。下标  $i$  为地区,代表 30 个省市,所选取的样本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 $t$  为时间,从 2000 年到 2014 年共 15 年。

数据主要来自中国各省市历年的统计年鉴、历年《中国统计年鉴》、国家统计局官方网站、国研网数据库、CNKI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等,部分变量部分年份存在数据缺失,利用移动平均法用后年份的数据对缺失的数据进行修正与补齐。

表 2 相关变量说明

变量	含义	变量
<i>serv</i>	说明服务业发展水平	地区人均第三产业总额的自然对数
<i>pro</i>	制造业效率指标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人均增加值的自然对数
<i>pgdp</i>	经济发展水平指标	地区人均 GDP 的自然对数
<i>gov</i>	政府规模	地区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i>exp</i>	开放程度	地区出口总额与 GDP 比例的自然对数
<i>urban</i>	城市化水平	非农人口占地区总人口比例的自然对数
<i>policy</i>	政府服务业发展政策	哑变量: 2003 之前取值为 0, 2003 年以及之后取值为 1

## (二) 回归结果及相关解释

由于设定的模型中含有被解释变量的滞后项,本文参考钱学锋(2009)使用的动态面板 GMM 估计方法,分别用差分 GMM 估计(difference-GMM)和系统 GMM 估计(system-GMM)两种方法对模型进行估计,系统 GMM 估计修正了差分 GMM 估计在过度识别方面的不足,增强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同时在计量过程中,对滞后项数进行调整和观察以更好地分析被解释变量的滞后期值对当期值的影响。

表 3(见下页)出了两种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前两列利用差分 GMM 估计,后两列利用系统 GMM 估计,两种估计的结果在方向上保持了一致性,同时检验结果显示估计方程的误差项不存在序列相关性(自相关检验  $p$  值大于 0.05),也不能拒绝工具变量有效性的零假设(Hansen test- $p$  值大于 0.05),这从总体上说明了模型设定的合理性。

从表 3 的回归结果来看,服务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其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这也意味着服务业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滞后 1 期的系统 GMM 回归系数为 0.39,滞后 2 期回归系数为 0.32,且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当前人均服务业产值提高 1 个百分点,会带来第二年服务业人均产值提高 0.39 个百分点,第三年服务业人均产值提高 0.32 个百分点。差分 GMM 回归估计结果也支持了上述结论,这充分说明服务业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服务业本身对其投入,因此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这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前文提出的假说。为了观察服务业发展的长期影响,我们又选择了 3 期的滞后变量进行回归,结果发现其回归系数也是显著为正。<sup>①</sup> 这个分析表明,如果服务业的初始水平较低,那可能会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形成发展路径依赖,从而

① 服务业的 3 期滞后变量回归系数为 0.14,并且在 10%水平下显著。

使其陷入低水平的循环发展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服务业为什么出现低水平稳态发展的趋势。

表3 服务业发展的独立性分析

解释变量	差分 GMM 估计			系统 GMM 估计		
	(a)	(b)	(c)	(d)	(e)	(f)
滞后 1 期 <i>serv</i>	0.44*** (0.081)		0.40*** (0.07)	0.57*** (0.07)		0.39*** (0.07)
滞后 2 期 <i>serv</i>		0.29*** (0.08)	0.21*** (0.08)		0.29*** (0.06)	0.32*** (0.06)
<i>pro</i>	-0.26 (0.21)	-0.22 (0.20)	-0.22 (0.20)	-0.38 (0.28)	-0.32 (0.21)	-0.31 (0.22)
<i>pgdp</i>	0.64*** (0.23)	0.46*** (0.21)	0.57*** (0.22)	0.51*** (0.08)	0.48*** (0.07)	0.49*** (0.07)
<i>gov</i>	-0.05*** (0.02)	-0.06*** (0.02)	-0.05*** (0.01)	-0.03*** (0.01)	-0.04** (0.02)	-0.10*** (0.02)
<i>exp</i>	0.58*** (0.06)	0.51*** (0.06)	0.54*** (0.06)	0.57*** (0.06)	0.50*** (0.05)	0.50*** (0.06)
<i>urban</i>	-0.16 (0.16)	0.02 (0.17)	0.05 (0.17)	0.22** (0.10)	0.27*** (0.08)	0.28*** (0.08)
<i>policy</i>	0.22*** (0.06)	0.10** (0.06)	0.15*** (0.06)	0.14*** (0.05)	0.12*** (0.04)	0.13*** (0.04)
常数	6.78*** (1.06)	4.76*** (1.07)	5.46*** (1.15)	3.81*** (0.65)	2.82*** (0.56)	2.86*** (0.63)
R <sup>2</sup>	0.58	0.72	0.69	0.73	0.79	0.79

注: 根据 stata13.0 软件计算 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此外,实证结果显示,制造业效率提高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其回归并没有通过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效率的提高并没有促进服务业发展。这可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有关。制造业大多是代工生产模式,无法对服务业产生中间需求,服务业发展缺乏制造业的市场支撑,相反还可能对服务业产生挤出效应。

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服务业发展起着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服务业发展的收入需求假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消费者更多地会倾向于消费服务产品而非物质产品,进而会带动服务业的发展。从全球经济发展现状来看,发达国家服务业占 GDP 比重要普遍高于发展中国家。

实证分析表明,政府规模越大,服务业发展水平越低。GMM 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汪德华等(2007)、江静等(2009)的结论。政府规模越大,财政支出占 GDP 比重越高,在政府公共职能缺失时,政府会将资源过多投资于基础设施等与经济增长直接相关的领域,而诸如医疗卫生、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有关民生的投入短缺,这也会极大限制服务业发展。

此外,经济外向型程度也对服务业发展水平也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出口额的增加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刺激作用。近年来总出口中的服务出口比重在逐年上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服务业发展水平的提高。城市化发展水平对服务业促进作用也不明显,而服务业发展政策的出台对服务业发展则有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 五、稳健性检验

上述分析表明,中国服务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为了更深入验证这种路径依赖规律,本文分地区和分行业进行稳健性检验。首先,按中国东、中、西三个地区的传统划分<sup>①</sup>分别对全国30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检验。根据计量结果(见表4),三个地区的服务业发展水平滞后一期和二期都对服务业发展产生了正效应,并且在统计上显著,从具体回归系数来看,东部与中部地区的促进作用表现的更强一些,而西部地区的自我促进效应相对弱一些,这可能是由于西部地区的服务业发展阶段相对比较滞后,落后于东部与中部地区。

表4 分地区的实证回归结果(系统GMM估计)

变量	东部	中部	西部
滞后1期 <i>serv</i>	0.56*** (0.06)	0.41*** (0.08)	0.12** (0.07)
滞后2期 <i>serv</i>	0.34*** (0.11)	0.19*** (0.07)	0.02*** (0.06)
<i>pro</i>	-0.21 (0.11)	-0.45 (0.90)	-0.48 (0.61)
<i>pgdp</i>	0.55*** (0.12)	0.47* (0.28)	0.28*** (0.08)
<i>gov</i>	-0.05*** (0.02)	-0.05*** (0.01)	-0.04** (0.02)
<i>exp</i>	0.78*** (0.06)	0.14 (0.21)	0.90 (0.35)
<i>urban</i>	-0.65 (0.55)	0.43 (0.34)	0.17*** (0.06)
<i>policy</i>	0.54*** (0.08)	0.06** (0.03)	0.01 (0.08)
常数	7.86*** (2.56)	3.77*** (0.98)	3.28*** (0.67)

注:根据 stata13.0 软件计算,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其次,本文利用具体细分行业进行稳健性检验。本文第三部分基于投入产出表计算的结果显示,部分行业近年来服务投入率比重逐年攀升速度较快,且服务投入高于制造投入,表现出明显的独立发展路径依赖。同时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选择交通运输和仓储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以及房地产行业这四个行业进行实证分析。回归结果如表5(见下页)所示。

回归结果显示,这四类服务行业滞后一期的发展水平都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当期该行业的发展,其中金融业的促进作用最为明显,回归系数为0.86,并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房地产业的回归系数为0.58,这意味着滞后一期的房地产业人均增加值提高1个百分点,可以使当期房地产业人均增加值提高0.58个百分点;批发零售业的回归系数为0.46,交通运输及仓储业回

① 东部地区的省市有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等11个,中部地区的省市有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个,西部地区的省市有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

归系数为 0.16,且都在 1%的显著性水平通过检验。这与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进行的服务投入率的核算结果基本一致。这四类行业的服务投入率相对较高,意味着这些行业发展更多依赖服务业的自身投入,进而表现出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实证分析也支持了上述假说。

表 5 部分细分行业实证分析结果(系统 GMM 估计)

变量	交通运输及仓储业	批发零售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滞后 1 期 <i>serv</i>	0.16*** (0.45)	0.46*** (0.12)	0.86** (0.09)	0.58*** (0.06)
<i>pro</i>	-0.66*** (0.11)	-0.39 (1.20)	-0.45 (0.57)	-0.89 (1.23)
<i>pgdp</i>	0.56 (0.81)	0.78*** (0.28)	0.18** (0.09)	0.54*** (0.09)
<i>gov</i>	-0.87*** (0.05)	-0.98*** (0.11)	-0.86*** (0.02)	-0.99*** (0.32)
<i>exp</i>	0.34*** (0.12)	0.87*** (0.09)	0.65*** (0.21)	0.76*** (0.27)
<i>urban</i>	-0.70* (0.45)	0.89* (0.61)	0.57*** (0.06)	1.01** (0.05)
<i>policy</i>	0.16*** (0.07)	0.33*** (0.01)	0.23*** (0.04)	0.41*** (0.13)
常数	9.98*** (3.21)	8.95*** (2.66)	7.85*** (1.58)	5.60*** (2.34)

注:根据 stata13.0 软件计算,括号内数值是标准误,\*、\*\*、\*\*\*分别表示在 10%、5%、1%的水平上显著。

## 六、简短的结论

本文主要探讨服务业在发展过程中是否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问题。基于中国投入产出表的核算表明,服务业发展的确存在相对独立发展的规律,服务业所需的中间投入中,服务投入比重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也意味着服务业发展越来越依赖服务投入,对其他物质部门投入的依赖则逐渐减弱。服务业整体的服务投入率从 2002 年的 44.33% 上升到 2012 年的 55.25%,说明服务业的服务投入比重已经超过物质投入,服务业发展受自身的初始发展水平影响越来越大。细分行业来看,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等行业的服务投入率都超过了 80%,表明这些行业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更为明显。

基于全国 30 个省市 2000-2014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服务业发展很大程度上受自身发展水平的影响,滞后 1 期的人均增加值的回归系数是 0.39,滞后 2 期回归系数为 0.32,且通过了 1%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意味着当前人均服务业产值提高 1 个百分点,会带来 1 年后服务业人均产值提高 0.39 个百分点,2 年后服务业人均产值提高 0.32 个百分点。分地区和分行业的稳健性检验也支持了上述结论,且发现东部地区的服务业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要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金融业和房地产业的独立发展路径依赖更为明显。

由于服务业具有独立发展的路径依赖,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就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内生性。服务业发展初始条件比较好的地区,服务业可能可以获得更快速的发展;而初始服务业发展较差的地区,服务业则保持长期低水平稳态发展趋势。这种路径依赖除非有外部因素加入才能打破。全球比较发现,目前中国服务业发展还处于较低水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阻碍“十三

五”时期中国制造业迈向中高端水平,也影响城乡居民收入水平比2010年翻一番目标的实现。

中国各级政府在制定服务业发展政策时,不能仅仅提出提高服务业占GDP比重这个目标,而应该更好地认识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规律,进而引导服务业自我发展。要以提高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为切入点,通过对内对外开放促进生产性服务发展,通过提高收入和完善分配制度来促进消费性生产性服务发展,通过资源均衡配置来促进公共服务发展(刘志彪,2014)。

参考文献:

阿尔文·托夫勒,2006《未来的冲击》北京:中信出版社。

程大中,2008《中国经济正在趋向服务化吗?——基于服务业产出、就业、消费和贸易的统计分析》,《统计研究》第9期。

江小涓、李辉,2004《服务业与中国经济:相关性和加快增长的潜力》,《经济研究》第4期。

江静、于明超、刘志彪,2007《生产者服务业发展与制造业效率提升:基于地区和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第8期。

江静、刘志彪,2009《政府公共职能缺失视角下的现代服务业发展探析》,《经济学家》第9期。

江静,2010《市场支持、产业互动与中国服务业发展:基于2000-2008省级数据的分析》,《经济管理》第3期。

刘志彪,2006《发展现代生产者服务业与调整优化制造业结构》,《南京大学学报》第5期。

刘志彪,2014《全面深化改革对服务业发展的牵引作用》,《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第2期。

裴长洪、夏杰长,2005《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基本格局、路径选择与战略思路》,江小涓,《中国服务业发展报告 No.4:中国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与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钱学锋、陈勇兵,2009《国际分散化生产导致了集聚吗:基于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 GMM 方法》,《世界经济》第12期。

汪德华、张再金、白重恩,2007《政府规模、法治水平与服务发展》,《经济研究》第6期。

曾世宏,2013《基于产业关联视角的中国服务业结构变迁——“自增强”假说及其检验》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Bhagwati, J.N. ,1984, “Splintering and Disembodiment of Services and Developing Nations ,” *World Economy* , (7) pp.133-143.

Francois , J.F. ,1990, “Producer Services , Scale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 *Oxford Economic Papers* ,42 , pp. 715-729.

Greenhalgh , C.& M. Gregory ,2001, “Structural Change and the Emergence of the New Service Economy ,” *Oxford Bulletin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63 pp.629-646 .

Grubel , H. G. & M. A. Walker ,1989, “Service and the Changing Economic Structure ,” *Services in World Economic Growth Symposium Institute*.

Hansen , N. ,1990, “Do Producer Services Indu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 30(4) pp.465-476.

North , D.C. ,1990 ,*Institutions ,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owthorn , R.& R. Ramaswamy ,1999, “Growth , Trade and Deindustrialization ,” *IMF Staff Papers* ,46 pp.18-41.

Park S.H. ,1994, “Intersectoral Relationships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 *ASEAN Economic Bulletin* , 10(3) pp.245-263.

Pialt ,D. & A. Wölfl 2005 “Measu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 STI Working Paper.

(责任编辑 王浩斌)

critical theory of Frankfurt School. In its view, popular culture can be reckoned as the consequence of emergence of consumer society, and considered as the inner requirement of capital, which leads to the homogeneity of society. Third, culture on the level of metaphysics and ideal, which provide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existence and history of human being.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being, culture on this level forms the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and exerts influence on human behavior. Hence, culture on this level refers to the liberation of human being and the realization of human potential and social harmony.

### **Is Service Sector in China Characteristic of Path-dependence and Developing Independently?**

*JIANG Jing*

China is now in its era of service economy, with service sector playing a leading role in economic growth, and yet the share of service sector in GDP is still smaller than the world average. Based on China's input-output table, this study shows that the ratio of service-input (as share of total intermediate input) rises from 44.33% in 2002 to 55.25% in 2012, which means service sector requires intermediate input mostly from the service sector itself, and is characteristic of path-dependence. An empirical study of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nationwide from 2000 to 2014 shows that the previous development of service sector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ervice sector with the significance of 1%. The robustness test also supports the above conclusions. It is found that service sector is more prominent in path-dependence in the eastern region than in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so are the financial and real estate industries. When making service policy, the government should consider this rule and encourages the service sector to develop independently.

### **On Market Foundation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A Study Based on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HONG Tao, MA Tao*

Market integration determines the endogenous force of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mong regions. Indices of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are calculated, and based on them, matrices of market relationship are constructed. These matrices are combined with the  $\beta$ -convergence model and spatial econometrics to analy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year of 2004 is a critical break point. Before that, there existed a trend of divergence and negative spillover effects between regions, as were strengthened by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Subsequently, there existed a trend of convergence and positive spillover effects, which were also strengthened by domestic market integration. Generated by agglomeration and comparative advantages, the positive relationship in between helps alleviate the problems of dynamic inconsistency of policies, so a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s.

### **On Judicial Review of the EU Antitrust Fine Decisions: Based on the Study of 90-plus EU Cases of Antitrust Law**

*HONG Ying-ying*

With the appearing disputes of anti-monopoly penalty,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judicial review of anti-monopoly penalty decision. According to Chinese law, the court has the